

論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之詩學意義 ——以蘇詩接受為核心

何庭毅*

摘要

清人潘德輿著《養一齋詩話》，奉《詩經》為主臬，傳達賦詩言志之詩教觀。此書品評清代詩話，稱翁方綱《石洲詩話》雖受推崇，部分觀點有待商榷，因由啟人疑竇。查考《養一齋詩話》，潘德輿從學詩進路入手，辯證翁方綱評蘇是非，因二書為乾隆朝及道光朝重要詩論，本文比對潘、翁學詩進路異同和蘇詩接受差異，一窺論爭因由和詩學意義。研究指出，道光朝時局動盪，潘德輿主張創作有裨政教，更須脫離唐、宋之爭。翁方綱亦重《詩經》，希冀由此調和唐、宋之爭，遂以學詩進路為題頌揚蘇詩，宣傳經學入詩合理性，乃受乾隆朝思潮影響欲迴避政治，卻也因此重蹈覆轍。為此潘德輿力排眾議，重新規劃學習《詩經》進路，主張蘇詩為別調，進而重振詩歌現實意義。是知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源自雙方蘇詩接受差異，導致學習《詩經》方式有別，凸顯乾隆至道光之際，詩壇隨著時局變遷，逐漸重視現實現象。

關鍵詞：潘德輿、《養一齋詩話》、翁方綱、《石洲詩話》、蘇軾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The Poetic Significance of Pan De-Yu's Critique on Poetry Discourses of Shi Zhou—Focusing on the Acceptance of Su Shi's Poetry

Ho Ting-Yi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Pan De-Yu's work, *Poetic Discourses of Yang Yi Zhai*, places the *Shi Jing* as a guiding principle, conveying poetic and educational views on expressing aspirations through poetry. This book critiques poetic discuss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praising Weng Fang-Gang's *Poetry Discourses of Shi Zhou* while acknowledging certain points that require scrutiny, sparking intellectual curiosity. In his examination of 'Poetic Discourses of Yang Yi Zhai,' Pan De-Yu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y exploring the paths of poetic learning and debating Weng Fang-Gang's evaluation of Su Shi. Both books are significant poetic treatises from the Qianlong and Daoguang era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paths of Pan and Weng's poetic scholarship, as well as the disparities in their reception of Su Shi's poetry,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asons for their disputes and the poetic significance therei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during the tumultuous times of the Daoguang era, Pan De-Yu advocated for creative works that contribute to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goals,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move beyond the Tang-Song literary debates. Weng Fang-Gang, also valuing the *Shi Jing*, aimed to reconcile the Tang and Song disputes through this lens, using the path of poetic learning to praise and propagate Su Shi's poetry while advocating the rational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 studies into poetry.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ical trends of the Qianlong era, seeking to avoid overtly political discussions,

both scholars inadvertently repeated historical mistakes. Against prevailing opinions, Pan De-Yu restructures the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Shi Jing, advocating for Su Shi's poetry as a distinctive style, thereby revitaliz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poetry. It is evident that Pan De-Yu's critique of Poetry Discourses of Shi Zhou stems from the divergent reception of Su Shi's poetry, resulting in disparate approaches to studying the Shi Jing and highlighting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poetic world from the Qianlong to the Daoguang era, wherein a gradual shift towards valuing realistic phenomena becomes apparent.

Keywords: Pan De-Yu, Poetic Discourses of Yang Yi Zhai, Weng Fang-Gang, Poetry Discourses of Shi Zhou, Su Shi

論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之詩學意義 ——以蘇詩接受為核心

何庭毅

一、前言

《養一齋詩話》是清代道光朝詩論，撰者潘德輿（1785-1839）字彥輔，號四農，平生致力講授經學，著作尚有《養一齋集》。潘德輿尊崇《詩經》，主張詩歌須裨教化受後世肯定，如陸以湑（1802-1865）云：「其論悉稟聖人詩教之旨，……近時詩話，當以此為首矣。」¹徐世昌（1855-1939）亦言：「其論詩曰：『詩宜痛刪改，必浮靡之音去，而真慤之氣來，話語有用，方謂之言立。』……味此數語，宗尚可知，足挽江左詩派之失。」²知《養一齋詩話》問世後，文士相繼表示推崇，有助矯治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2）等詩學不足之處，更有當時詩話第一美譽，重要性可見一斑。

《養一齋詩話》內容多元，包含詩家高下、詩歌優劣、詩話品評等，其中有關清人詩話，潘德輿總體評價：

近人詩話之有名者，如愚山、漁洋、秋谷、竹垞、確士所著，不盡是發明第一義，然尚不至滋後學之惑。滋惑者，其隨園乎？人紛紛訾之，吾無可論矣。獨《石洲詩話》一書，引證該博，又無隨園佻纖之失，信從者多。予竊有感焉，不敢不商榷，以質後之君子。³

¹ 清·陸以湑：《冷廬雜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7，頁22上，「養一齋詩話」條。

² 清·徐世昌：《晚晴移詩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32，頁27下。

³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卷1，頁2011。以下引用

清代初期至中期詩話，唯袁枚（1716-1798）《隨園詩話》屢遭責難，餘者如施閏章（1618-1683）、王士禛（1634-1711）等人著作，雖不盡然闡揚詩教，均有可觀之處。當中翁方綱（1733-1818）著《石洲詩話》，因引證詳實而備受推崇，獨潘德輿稱其論有待商榷，明顯違背主流評價。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谿、蘇齋，兼通金石、考據、經學，是乾隆詩壇大家之一，著作另有《復初齋詩集》、《復初齋文集》等，因學識淵博享譽一時。如王昶（1724-1806）表示：「覃溪年甫及冠，已入詞垣，而精心績學，宏覽多聞。」⁴錢泳（1759-1844）更云：「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金石文字。」⁵足見《石洲詩話》引證該博特色不假，亦知翁方綱在詩壇頗具影響，為何潘德輿不憚非議，箇中因由啟人疑竇。

查考學界相關研究，郭紹虞和吳宏一各有論述。郭紹虞從唐、宋之爭角度，表示潘德輿宗主唐音，反對翁方綱擁護宋調。⁶吳宏一指出，潘德輿景仰李、杜，主張學詩由二人詩歌入門，方習蘇、黃以次詩家；翁方綱雅重蘇、黃，無論尊崇對象或學詩進路，和潘德輿大相逕庭。⁷二說孰是孰非，現今研究著墨不多，卻不乏學者表態，如丁憶如梳理二家觀點，服膺吳宏一說解。⁸另外何繼文分析翁方綱學詩進路，提及潘德輿囿於唐、宋，評價出於意氣而不盡客觀。⁹劉亞文則探討潘、翁闡釋元好問（1190-1257）《論詩絕句三十首》差異，提出潘德輿重視雅正，不滿翁方綱標舉蘇、黃，而推尊元佑詩風，¹⁰兩者結論近似郭紹虞。其餘研究分成兩類，一為分析潘、翁

為免冗蕪，均採隨文引注。

4 清·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收入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卷15，頁509，「翁方綱」條。

5 清·錢泳：《履園叢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6，頁3上，「覃溪閣學」條。

6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1023。

7 吳宏一：〈格調說〉，《清代詩學初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第六章，頁211。

8 丁憶如：〈「忠愛隨地施」——潘德輿《養一齋詩話》的論詩特質〉，《興大人文學報》47（2011.9），頁74-75。

9 何繼文：〈翁方綱的「由蘇入杜」說〉，《漢學研究》28：3（2010.9），頁162。

10 劉亞文：〈由蘇入杜：論翁方綱學人之詩理論體系的建構〉，《文學遺產》2020：4（2020.7），頁190。

個人詩觀，¹¹二是探究翁方綱談學詩，如何達到由蘇入杜，¹²與此議題無直接關聯。

整體而論，郭、吳二說值得借鑑，但論述角度不同，及後人支持意見不一，代表尚存闡述空間。實際上，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篇幅甚長，依據主題共分三大段落，一是著眼學詩進路，批評翁方綱學蘇不當；二是節錄翁方綱箋注《論詩絕句三十首》中蘇軾（1037-1101）相關詩句，另申己意重新詮釋；三是臚列翁方綱品評前人如蘇軾、白居易（772-846）、杜牧（803-852）等，逐一辯證其說是非。由此推論，潘德輿批評非侷限學詩進路，尚擴及蘇詩接受差異，前人研究未曾提及，無法具體說明因由。更重要的是，《石洲詩話》和《養一齋詩話》，乃乾隆朝與道光朝重要詩論，透過分析潘、翁蘇詩接受差異，有助梳理清中葉詩學轉變，擴展相關研究視野。職是之故，本文擬採《養一齋詩話》評語為主，對照《石洲詩話》和相關論著，採取兩階段論述。首先，從學詩進路開始，比較潘、翁詩論異同，藉此釐清批

-
- ¹¹ 臺灣方面著作較少，單篇論文有張高評〈翁方綱《石洲詩話》論宋詩宋調——以蘇軾、黃庭堅詩為核心〉，探討翁方綱如何透過標舉蘇、黃，表彰宋詩風格與特色。見張高評：〈翁方綱《石洲詩話》論宋詩宋調——以蘇軾、黃庭堅詩為核心〉，《文與哲》22（2013.6），頁403-440。學位論文可再分成兩類，一是潘德輿詩論研究，參卓月娥《潘德輿詩論研究》，全面分析潘德輿生平 and 詩學。見卓月娥：《潘德輿詩論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二是翁方綱詩論研究，參楊淑玲《翁方綱肌理說研究》，歸納肌理說成因與定義。見楊淑玲：《翁方綱肌理說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中國方面論述甚多，潘德輿部分，學位論文如張文萍《〈養一齋詩話〉研究》，分析潘德輿詩學主張，以及如何評論前人詩論，其中包括翁方綱《石洲詩話》，見翁方綱：《〈養一齋詩話〉研究》（牡丹江：牡丹江師範學院文藝學碩士論文，2012）。另如徐然《潘德輿詩學思想研究》，分析潘德輿主張兼容並蓄，及個人創作的宗唐傾向，見徐然：《潘德輿詩學思想研究》（無錫：江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翁方綱部分，單篇論文甚多，茲舉其要如蔣寅〈翁方綱詩學的取法途徑與理論支點〉，認為翁方綱建立宗尚杜、韓、蘇、黃、元譜系，並以事鏡之說構築學人之詩理念。見蔣寅：〈翁方綱詩學的取法途徑與理論支點〉，《學術研究》2017：6（2017.6），頁142-178。又唐藝藝〈文學史視域中的翁方綱宋詩學〉，探究翁方綱如何從詩歌發展流變，闡釋唐、宋詩同源思想。見唐藝藝：〈文學史視域中的翁方綱宋詩學〉，《文藝理論研究》5（2015.9），頁158-185。學位論文數量亦多，如楊小華《翁方綱詩學研究》，透過梳理肌理說意涵，剖悉翁方綱詩學。見楊小華：《翁方綱詩學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09）。另外鄭才林《翁方綱詩歌創作及其詩學思想研究》，闡述翁方綱詩歌特色，與肌理說如何影響學人之詩。見鄭才林：《翁方綱詩歌創作及其詩學思想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6）。
- ¹² 臺灣方面可參何繼文〈翁方綱的「由蘇入杜」說〉，分析翁方綱運用肌理說，由蘇詩貫通杜詩，了解詩歌創作總則。見何繼文：〈翁方綱的「由蘇入杜」說〉，頁135-165。中國方面，可參蔣寅〈翁方綱宋詩批評的歷史意義〉，研究翁方綱溝通杜、蘇關聯，擴大宋詩影響力。見蔣寅：〈翁方綱宋詩批評的歷史意義〉，《中國詩學研究》1（2018.12），頁93-104。

評動機；其次，分析潘、翁蘇軾接受差異，探究此次爭議在清中葉詩學意義。

二、學詩進路異同與批評因由探析

《養一齋詩話》共計十卷，前後評語鮮有關聯，各卷亦無固定主題，似為潘德輿讀書雜感，故評語多數簡要。惟於卷一批評《石洲詩話》，特別採用長篇辯證，凸顯翁方綱詩論不足，茲錄二段文字以窺一斑：

今望而生怖，謂不如蘇之蹊徑易尋，則是避難就易之私心，猶書家之有側鋒，仕途之有捷徑，自為之可耳，豈所以示天下耶！

夫以蘇之豪於詩，而倡言學之者猶足累人，況降於此者哉！論詩者誠不可不慎於言矣。（卷1，頁2012-2014）

反對翁方綱側重蘇詩，要求學子由此入門，因此如何正確學詩是《養一齋詩話》重要議題。然而翁方綱詩學淵博，論述遍布《石洲詩話》、《復初齋文集》等，潘德輿僅執《石洲詩話》數語為證，是否洞澈其說？下文梳理二人學詩進路，探討潘德輿批評因由，分述如次。

（一）潘、翁學詩進路探討

潘德輿以《詩經》為核心，汲取詩言志、思無邪理念，¹³倡議創作須裨教化。《詩經》為五經之一，具鮮明政教意義，故潘德輿標舉詩教，主張初學必正性情：

後世之士，若不為人，則不復學詩；搦管之先，祇求勝人，多作之後，遂思傳世，雖久而成集，閱之幾無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嘗學詩也。分曹詠物之作，酬和疊韻之體，……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卷1，頁2006）

《詩經》自歸儒家經典，詮釋轉趨溫柔敦厚，用於表達純正意念。潘德輿藉機抨擊

¹³ 潘德輿聲明：「『詩言志』，『思無邪』，詩之能事畢矣。」見其詩學注重詩教，認為詩歌不僅抒發志向，更應宣揚純正思想。見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1，頁2006。

沽名釣譽者，終日汲營唱和無益教化。是知潘德輿賦予創作嚴肅意義，反對詩歌娛情功能，甚至用於吟詠風月，堅守儒家傳統思維。

在詩教觀主導下，潘德輿凸顯詩家性情功用，作為評判詩歌準則，¹⁴視性情與創作一體。不過性情寓於身心，終究屬於抽象概念，與創作講求技法、辭藻等實務仍具隔閡。潘德輿亦知己說不足，特別援引朱熹（1130-1200）詩論，提出質實理念：

朱子論詩，謂「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為一等，……欲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愚按詩之源流得失，實盡此數十言之中。學者誠知詩無可學，而日治其性情學問，則詩不學而亦能之。必不得已，遵朱子此論，而採摘精審，專一沈潛，庶乎其不悖於聖人之詩教，而足為能詩之士矣。（卷1，頁2017-2018）

朱熹曾欲編纂選本，按詩歌發展和時代次序，劃分虞、夏至漢、魏，晉代至初唐，沈、宋至南宋三階段，同時鑑別歷代詩歌優劣。該書採《詩》、《騷》為準則，擇經、史所載詩歌、《文選》和漢、魏古詩，及郭璞（276-324）、陶潛（365-427）諸作為指引，¹⁵認為學子逐日研習，氣格見識自然見長。

此種作法切合潘德輿詩學，尤其標舉《詩》、《騷》為圭臬，更合乎儒家詩教，但是同時指出：

三代兩漢之世，人唯無作，作則未有不工者，性情學問，陶冶深矣。故善讀書者無不能，而能者亦不必作，作亦不以之自喜。（卷1，頁2017-2018）
尚性情者無實腹，崇學問者乏靈心，論甘忌辛，詩教彌以不振；必當和為一

¹⁴ 潘德輿強調，詩家人品和性情高低，足以決定詩歌優劣，不過實務上未必如此，故云：「人與詩有宜分別觀者，人品小小繆厲，詩固不妨節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惡，則并其詩不得而恕之。」即詩家人格白璧微瑕，其詩仍有可取之處，惟不可輕易學習。潘德輿舉阮籍、陳子昂為例，前者趨附司馬昭勸進帝位，後者諂媚武曌請立九廟，均屬小人行徑，雖文學上多有建樹，均為言過其實。見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1，頁2008-2009。

¹⁵ 宋·朱熹：〈答鞏仲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64，頁3095。

味，乃非離之兩傷。(卷2，頁2029)

呼籲學詩不假外緣，甚至無須蹈襲前人，只要兼顧性情和學問，創作自然水到渠成。潘德輿據此批評，後人不學無術，雖然成果看似豐碩，內容普遍平乏無奇。因此，性情、學問相輔相成，學子若存偏尚，無法闡揚詩教。值得注意的是，縱然潘德輿尊奉《詩經》，甚至為了切合詩教訂立學習規範，卻聲明《詩經》不可仿效：

《三百篇》之體製音節，不必學，不能學；《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學也。神理意境者何？有關係寄託，一也；直抒己見，二也；純任天機，三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四也。(卷1，頁2007-2008)

潘德輿阻止習《詩》，源於清代去古已遠，體製音節迥異古人，回溯既往不切實際。不過，上述原由乃就形式而論，學子當擇後世優秀詩家，承繼《詩經》理念。

從前文徵引《養一齋詩話》可知，漢、魏近於古聲，時常和先秦並稱。尤其在質實理念中，漢、魏詩家善於陶冶性情、學問，可謂通往《詩經》津梁，具承先啟後地位。潘德輿指出：「夫以宗漢、魏祧〈風〉、〈雅〉為不妄，而不知其為無頭腦學問，乃妄之尤者也。且既不知〈風〉、〈雅〉，又何以宗漢、魏、李、杜哉！」(卷10，頁2164)此處批評明人顧璘(1476-1545)曾言，論詩無須談及《詩經》，只要追溯漢、魏、李、杜諸賢即可。¹⁶潘德輿反對此說，並以質實為主軸，建構《詩經》、漢、魏、李、杜之學詩進路。

在此進路中李、杜具特殊意義，潘德輿直言：「朱子曰：『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予篤信此說。」¹⁷初學不可躐等，當由李、杜詩歌入門，方鑽研蘇、黃各體，表明潘德輿心目中，蘇、黃難與李、杜比肩。具體因由如下：

三代以後，〈風〉、〈雅〉、〈頌〉之體，不可摹襲，而賦、比、興，則作者之性情，觸物流露，雖無〈風〉、〈雅〉、〈頌〉之貌，而實〈風〉、〈雅〉、〈頌〉之

¹⁶ 「今世論詩者，言〈風〉、〈雅〉則妄耳，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今賢雖眾，儻能訾議，則詞林之規矩在是矣。」明·顧璘：〈與陳鶴論詩〉，《顧華玉集·息園存稿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9，頁14下。

¹⁷ 清·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清詩話續編》，卷1，頁2168。

心也。……惟子美以志士仁人之節，闡詩人比興之旨，遂足為古今冠。¹⁸

嚴氏羽曰：「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學者於每篇中，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然謂「李、杜二集，須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則吻合朱子之論，不可攻也。其謂太白詩有「安身立命處」，……究之若何？吳子華所謂「太白詩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遺」者。¹⁹

《詩經》中賦、比、興屬創作技巧，受儒家思想影響，後人闡釋多擇比、興，導致詩歌多附會忠愛。此種解讀至杜詩發揚光大，因杜甫（712-770）時刻抱負忠愛，不僅居歷代詩家首位，更是通往《詩經》正軌。另外李白素與杜甫並稱，影響力亦亙古今，雖詩歌飄逸不羈，思想仍根植詩教。由二人詩歌入門，方能正確回溯《詩經》，除此之外均非正途，即便蘇、黃等名家，無法列名其中。

總而言之，潘德輿受儒家詩教影響，透過標舉詩言志、思無邪，強調詩歌政教功能。他要求學子端正性情，更藉治學成就質實，並以此為主軸，建構李、杜入門，回溯漢、魏，終歸《詩經》之進路。

翁方綱學詩進路，與康熙至乾隆詩壇，調和唐、宋思潮攸關，如蔣寅曰：

清初錢謙益、王士禛之提倡宋詩，曾使唐詩的典範性受到很大衝擊，尤其是杜甫有些被冷落，……如何使唐宋詩的藝術精神得以溝通，如何維護杜甫的典範性不至失墜，成為翁方綱詩學的一個基本出發點。²⁰

清代論詩區分唐、宋，自宋詩崛起後，杜甫地位隨之動搖，如何溝通兩者並維護杜詩，成為翁方綱建構學詩進路初衷。《詩經》身為詩歌源頭，足以成為調和關鍵，惟自南宋嚴羽（?-1245）聲明「詩有別趣，非關理也」，²¹宋詩大率講求義理，長期摒除於《詩經》傳統外。翁方綱重新定義理字，辯證兩者關聯：

理者，綜理也，經理也，條理也。《尚書》之文，直陳其事，而《詩》以理之也。直陳其事者，非直言之所能理，故必雅麗而後能理之。……此下句曰：

¹⁸ 清·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2，頁2184-2185。

¹⁹ 清·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1，頁2170。

²⁰ 蔣寅：〈翁方綱宋詩批評的歷史意義〉，頁95。

²¹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詩辨〉，《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7），頁26。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此即理字自注也。理者，聖人理之而已矣，凡物不得其理，則借議論以發之，得其理則和矣，豈議論所能到哉？²²

援引韓愈（768-824）〈薦士〉中，「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²³之理字，認為雅麗對應《詩經》，訓誥代指《尚書》，即前者內容出自後者。因此「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原是韓愈不敢妄議孔子（551B.C.-479B.C.），引申事物須由議論彰顯，唯有《詩經》出自聖人，方真正融攝議論於文辭。

透過以上辯證，《詩經》不只抒發性情，同時蘊含議論，宋詩得以歸根《詩經》。以此為基礎，翁方綱標榜宗法杜甫，正式奠定其詩價值：

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教，全見於〈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經訓，為《風》、《騷》之本，不但如後人第為綺麗而已。²⁴

若論杜詩，則自有詩教以來，溫柔敦厚，必歸諸杜；興觀羣怨，必合諸杜；上下古今，萬法源委，必衷諸杜。²⁵

杜甫深受《詩》、《騷》薰陶，畢生思想根植儒學，並藉創作羽翼名教，因此詩歌緊扣詩教，乃學習《詩經》不二法門。不過翁方綱另曰：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既大，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不可學者（卷1，頁1375-1376）

杜詩兼容兩漢與魏、晉風骨，下啟宋、元新變，可謂集詩歌大成。憑藉深厚學養，杜甫縱橫多樣風格及題材，²⁶翁方綱恐學子才力有限，呼籲不可剽襲體貌，僅須取徑

²² 清·翁方綱：〈韓詩雅麗理訓誥理字說〉，《復初齋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0，頁15上-15下。

²³ 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薦士〉，《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頁355。

²⁴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清詩話續編》，卷1，頁1380。以下引用為免冗蕪，均採隨文引注。

²⁵ 清·翁方綱：〈評陸堂詩〉，《復初齋文集》，卷10，頁17上-17下。

²⁶ 翁方綱認為杜甫學識根植儒門，因此詩歌承繼《詩》、《騷》，無論撰作各式風格、題材，均以羽翼名教為宗旨，達成形式與內涵的平衡。如以杜甫〈偶題〉為例，翁方綱釋「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句：「無如飛騰而入者，已讓過前一輩人，不得不懷江左之逸、謝鄴中之奇；而緣情綺麗，斯已降一格已相從矣。」即詩歌以《詩》、《騷》為尊，魏、晉詩家猶存可觀，南北朝詩家多賦情思，風格趨

杜甫詩法，方能日後別開生面。²⁷

亦因如此，翁方綱稱蘇軾乃宋代詩家之首，詩歌承襲杜甫詩法，學詩當由此拾級而上：

杜云：「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此二句必一氣讀，乃明白也。所賴乎陶冶性靈者，夫豈謂僅恃我之能事以為陶冶乎？僅恃在我之能事以為陶冶性靈，則必致專聘才力，而不哀諸節制之方，以杜公之精詣，尚不敢也。……吾嘗謂蘇詩亦有一語可作通集總序者，曰：「始知真放本精微。」真放者，即豪蕩縱橫之才力，即此上七字也。精微即細肌密理之節制，即此下七字也。²⁸

「孰知二謝將能事」二句，出自杜甫《解悶十二首》第七。杜甫喜愛謝靈運（385-433）和謝朓（464-499）性情流露，更景仰陰鏗（511-563）、何遜（468-518）文辭錘鍊，可視為杜詩總序，²⁹即藉精湛技法抒發性情。蘇軾能闡揚杜法，因其詩「始知真放本精微」句，³⁰精微即是蘇詩特色，透過縝密觀察及思維，節制豪放不拘才力，傳達細膩深刻義理。³¹翁方綱更進一步，指真放為豪放不拘之才力，等同「孰知二謝將能事」；精微乃貫徹事理之節制，一如「頗學陰何苦用心」。說明杜、蘇格局豪放，

於靡麗，價值則更形低下。杜詩固見緣情之作，不過翁方綱澄清：「又無奈所遇不偶，遷流羈泊，併所謂緣情者，只用以慰漂蕩，尤可慨也。……遠想《風》、《騷》，低徊堂構，牽連綴述，縷縷及之。」杜甫所詠之情思，並非拘泥男女私情，而是感懷自身漂泊不遇，吻合古人賦詩言志之教。足見杜甫學養深厚，創作貫徹《詩》、《騷》宗旨，故能縱橫各式風格、題材。參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1，頁1380。

²⁷ 翁方綱在〈格調論中〉，反對明代七子派宗法盛唐，僅務形似而省略內涵，指出：「即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宋詩盛於熙、豐之際，蘇、黃集中有一效盛唐之作者乎？」足見詩家仿古，貴於融攝旨要而自出機杼。參清·翁方綱：〈格調論中〉，《復初齋文集》，卷8，頁4上。

²⁸ 清·翁方綱：〈與葉筠章論陰何苦用心句法〉，《杜詩附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5，頁11下-13上。

²⁹ 清·翁方綱論「頗學陰何苦用心」句，謂：「此篇即杜詩全集之總序也。」參清·翁方綱：《杜詩附記》，卷15，頁11下，「與葉筠章論陰何苦用心句法」條。

³⁰ 宋·蘇軾著，宋·施元之注，清·邵長蘅刪補：〈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施注蘇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34，頁25上。

³¹ 精微之意，據何繼文解釋：「指歷代詩作的精深妙境，能達致精微，必須有細肌密理。」見何繼文：〈翁方綱的「由蘇入杜」說〉，頁161。

均藉縝密思維節制，誠詩歌創作極則。唯有從蘇詩學習，方能認識杜詩精髓，並繼承詩教精神。

總而言之，翁方綱的學詩進路，受調和唐、宋思潮影響，藉由辯證理字內涵，兼容二者於《詩經》，奠定杜詩典範性。惟杜甫才力雄深，深恐學子難以企及，改由蘇詩拾級而上。翁方綱稱精微是蘇詩特色，採細膩思維節制豪放氣勢，與杜法遙相呼應。故初學當由蘇詩入門，繼而學習杜詩精神，最終回歸《詩經》傳統。

（二）潘德輿批評因由析論

從前文分析可知，潘、翁學詩進路明顯不同，卻存在相似之處。首先，兩者均奉《詩經》為依歸，視為歷代詩歌源頭，並認同儒家詩教宗旨；其次，兩者齊稱《詩經》不可仿擬，欲求古代詩家精神，須效法後世優秀詩家。由於杜甫地位崇高，兼創作有裨政教，是最佳入門指南，不過歧異於茲開展。潘德輿表示：

其書亦推張曲江為復古，李、杜為冠冕，杜可直接《六經》。而酷好蘇詩，以之導引後進，謂學詩祇此一途，雖根本忠愛之杜詩，必不可學，「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嚨，以為我輩亦可如此，所以棼如亂絲」。……今望而生怖，謂不如蘇之蹊徑易尋，則是避難就易之私心。……若自甘偏霸，遂斥中聲，震其大名，從之而靡，不能不為所累也。夫以蘇之豪於詩，而倡言學之者猶足累人，況降於此者哉！（卷1，頁2010-2012）

承認翁方綱不廢杜詩，並維護杜甫典範性，尚有可取之處；惟側重蘇詩，而稱杜詩不可學，提倡學子改習蘇詩，乃避難就易之私心。對於潘德輿而言，學習《詩經》沒有捷徑，³²自漢、魏以後詩家，唯李、杜方稱雅正，蘇軾雖享譽宋代，實未承繼詩教，不可作為入門典範。

然而亦須說明，此段評語是潘德輿個人見解，是否洞悉翁方綱詩學，不可據此

³² 潘德輿表示：「先愛敏捷，次必艱苦，終歸大茫學詩之三境也。夫煉意、煉氣、煉格、煉詞，皆煉也。近人專以煉字為詩，既求小巧，必入魔障。」詩歌替政教服務，絕非出於追求名利，學子入門不經正途，必然背離詩教，故學詩無旁門可循。尤其詩歌是多種因素組成，部分詩家為求速成，一味鑽研藻飾文辭，或致力營造意境，終究一事無成。李、杜詩歌固不易學，捨此之外更無正軌，不可因噎廢食。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2，頁2028-2029。

定奪。比對雙方詩學，共可發現兩點謬誤，一是認為翁方綱偏好蘇詩，尤其青睞豪放詩風，實自甘偏霸。毋庸否認翁方綱重視蘇軾，卻非稱許其詩豪放，唯有刻劃事理之精微，才是蘇詩旨要所在。二是承認翁方綱尊重杜詩，但要求學子另從蘇詩，有避難就易之嫌。不過翁方綱未逃避學杜，只是反對剽襲體貌，恐學子無法別開生面；再者由蘇詩入門，絕非故步自封，而是習杜必備歷程。

是知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確實始於學詩進路差異，惟關鍵在如何學習《詩經》，雙方未凝聚共識。尤其蘇詩因雙方評價不一，是否具有回溯《詩經》作用，成為此次爭議焦點。潘德輿學詩進路，以質實為號召，建構李、杜入門，銜接漢、魏，上承《詩經》模式。質實由性情和學問構成，前者更是詩教核心，潘德輿解釋：

予究其所謂性情者，最高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耳，其下則歎老嗟窮，志向齷齪。其尤悖理！……吾所謂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彊禦，不侮鰥寡之本原也。（卷 10，頁 2155）

創作為政教服務，故性情絕非個人情感，而是崇高道德思維。尤其「柔惠且直」句，出自《詩經·大雅·崧高》，是以詩教節制情感，展現百折不撓、和順謙抑之社會責任。

亦因過度強調詩教，排斥詩家排遣情致、吟風弄月，不免限縮詩歌多元性與趣味性，導致質實近乎迂腐，潘德輿以漢、魏詩歌為例，說明理想質實境界：

或言詩貴質實，近於腐木溼鼓之音，不知此乃南宋之質實，而非漢、魏之質實也。南宋以語錄議論為詩，故質實而多俚詞；漢、魏以性情時事為詩，故質實而有餘味。分辨不精，概以質實為病，則淺者尚詞采，高者講風神，皆詩道之外心，有識者之所笑也。（卷 3，頁 2044）

此處將質實區分兩類，即南宋與漢、魏二分，南宋大率議論為詩，內容淺白而文辭俚俗；漢、魏詩家性情雅正，多取時事抒發感懷，內容自然深刻雋永。潘德輿藉此強調，質實作為重要詩學理念，並非侷限追求形式，更能權衡文質比例，兼顧文學雅趣和政教目的。

更重要的是，以純正性情為核心之質實，也彰顯時代思潮和詩歌風氣關聯，成

為品評歷代詩歌高低準則，潘德輿指出：

嚴羽《滄浪詩話》，能於蘇、黃大名之餘，破除宋詩局面，亦一時傑出之士，思挽回風氣者。……然訾滄浪者，謂其專以妙悟言詩，非溫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議論為詩，故滄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滄浪謂漢、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聲也。漢、魏尚不假妙悟，況《三百篇》乎？（卷1，頁2010-2011）

綜觀歷代詩話，潘德輿景仰嚴羽《滄浪詩話》，³³特別為他高舉妙悟，與反對者展開論辯。因妙悟頗涉禪機，著眼詩家才能、悟性，誠如嚴羽自述：「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³⁴一味追求言外意趣，不免流於高談，內容轉趨空泛。潘德輿不否認此說，但強調提倡妙悟，乃針砭南宋詩風，實不得已而為之，尤其嚴羽更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³⁵表明創作須效漢、魏，重視個人性情闡揚，便毋庸假道妙悟。

潘德輿服膺嚴羽詩學，著眼其論抗衡南宋以來，蔚為風潮之蘇、黃詩風。從前述兩則引文可知，南宋「以語錄議論為詩，故質實而多俚詞」，或「率以議論為詩」，號召以古文為詩，內容多述義理哲思，文辭趨於俚俗浮露。實際上，歷代不乏詩家嘗試，然而成果毀譽參半，如蔣寅所言：

在古代所有文體中，詩的體位無疑是最高的。……詩在眾文體中毫無爭議地居於首位，它可以像其他文體滲透，而其他文體則不得反其道而行之，這在古代文論中常表現為避忌的言說。³⁶

與散文、賦、詞、曲等文類相較，詩歌萌芽自先秦時期，尤其具有言志作用，位居眾文體之首，是古典文學代表。因此，唯有詩歌能入其他文類，反之則不可，甚至

³³ 郭紹虞表示：「他於宋人詩話，自言：『嚴羽之外，祇服張戒《歲寒堂詩話》為中的。』（卷一）也即因嚴羽能破宋詩局面，而張戒重在言志的關係。一取其宗唐，一取其詩教。」足見宋人詩話中，潘德輿最重《滄浪詩話》，其次是《歲寒堂詩話》，乃取二人宗主唐音和賦詩言志，觀點切合詩教理念。見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1023-1024。

³⁴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詩辨〉，《滄浪詩話校釋》，頁26。

³⁵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詩辨〉，《滄浪詩話校釋》，頁12。

³⁶ 蔣寅：〈中國古代文體互參中「以高行卑」的體位定勢〉，《中國社會科學》2008：5（2008.9），頁153。

成為一種禁忌。

面對詩歌與散文互參現象，潘德輿評論：

漢、魏詩似賦，晉詩似〈道德論〉，宋、齊以下似四六駢體，唐詩則詞賦駢體兼之，宋詩似策論，……風氣所趨，雖天地亦因乎人，而況於文章之士哉！（卷2，頁2023）

整體而論，歷代隨著文類變遷，詩歌均見互參情形，乃文學發展必經趨勢，詩家行此無可厚非。尤其綜觀唐、宋，又以韓愈、蘇軾精於此道，成果亦稱斐然，惟潘德輿表示：

昌黎詩有鬪勝之意，東坡詩有遊戲之意，皆非古音，而昌黎古於東坡者，昌黎讀書精于東坡故也。（卷2，頁2023）

韓昌黎、蘇眉山皆以文為詩，故詩筆健崛駿爽，而終非本色。（卷2，頁2035）

兩處文字似無褒貶，客觀評述韓、蘇以文為詩，但是關鍵在於「皆非古音」、「終非本色」。潘德輿繼承傳統見解，注重詩歌本質呈現，雖不特意稱此舉為弊病，亦不贊同後人仿效。蘇詩大量文體互參，帶動南宋詩風近似語錄，有違潘德輿質實理念，與漢、魏力主性情背道而馳，不可納入學詩進路。

相較之下，翁方綱也尊奉詩教，但是不同潘德輿追求質實，而是意在調和唐、宋之爭。此辨證過程中，蘇詩存在有其必要，即如前文所言，宋詩講求以文入詩，為了證明此種作法上承《詩經》，甚至合乎唐詩審美，蘇詩於宋代成就最高，便具典範意義，如劉亞文指出：

在翁氏看來，東坡於用捨行藏之間，不拘於曾點的淡泊灑脫，而深諳「老安少懷」之義，得聖人之心，與老杜一樣，不能僅以詩人目之。……在此種境況之下，文學成為他們表達責任意識、實現淑世理想的精神途徑。而具有言志、載道功能的詩和文，自然是寄託情感的首選，故而，進一步提升這兩種文體的社會功能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這大概正是古文運動至北宋依舊如火如荼，詩歌也表現出更加濃郁的「以文為詩」特色的思想基礎。³⁷

³⁷ 劉亞文：〈由蘇入杜：論翁方綱學人之詩理論體系的建構〉，頁186。

宋人對於投身政治，往往呈現兩類心態，仕途順遂時展現淑世理想，遭遇挫折後不惜急流勇退，展現深刻儒家思維。³⁸詩、文原用於言志，也是宋人致仕主要寄託，故在北宋古文運動催化下，呈現以文入詩情形，合乎《詩經》載道精神。而宋代士人中，蘇軾思想以儒家為根柢，雖穿梭釋、老之間，表面看似瀟灑不羈，實有濟世安民之宏願，與杜甫相同深得聖人之心。因此，宋人好取議論、義理入詩，頗受宗唐者非議，卻得益於蘇詩成就，順利繼承《詩經》、杜詩傳統。

綜上所述，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表面看似學詩進路不同，實際關乎學習《詩經》時，如何定義蘇詩作用。對於潘德輿而言，學詩以質實為宗旨，秉持漢、魏純正性情，便能達到文質合一境界。為此潘德輿澄清質實定義，指南宋詩家受蘇軾影響，相繼標舉以文入詩，曲解質實為俚俗淺白，偏離漢、魏至李、杜雅正詩風，排除蘇詩於學詩途徑之外。翁方綱亦遵奉詩教，不過並非端正性情，而是用於調和唐、宋，因此蘇詩不可或缺。與潘德輿立場相反，翁方綱承認以文入詩，能夠回溯《詩經》傳統，而蘇詩特色近似杜詩，證明由蘇入杜可以成立。足見此次批評原因，涉及層面相當廣闊，與蘇軾接受密不可分。

三、蘇詩接受差異與詩學意義探微

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肇因如何學習《詩經》，尤其蘇軾是否上承李、杜，成為此次爭議核心。後續以此為基礎，臚列翁方綱蘇詩評論，逐一辯證是非，並且總結：「雖詩教廣大，各明一義，亦無不可，然心目之間，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揚前哲。」（卷1，頁2013）翁方綱重視蘇軾無謂對錯，但受偏好影響無法正確評價其詩。言下之意，潘德輿不僅針對翁方綱詩學，更溯及蘇軾接受，此舉用意為何？鑒於二書是乾隆朝及道光朝重要著述，論爭是否與清代詩學遞嬗攸關？下文探討潘、翁蘇詩各體接受，及此次爭議詩學意義，分述如次：

³⁸ 劉亞文：〈由蘇入杜：論翁方綱學人之詩理論體系的建構〉，頁186。

（一）蘇詩各體接受差異

蘇軾身為宋詩大家，對於後世影響不遜李、杜，但受唐、宋之爭波及，其詩評價褒貶不一。潘德輿特別針對蘇軾七律是否可學，批評《石洲詩話》論述不確，因翁方綱曾云：

宋人七律，精微無過王半山，至于東坡，則更作得出耳。阮亭嘗言東坡七律不可學，此專以盛唐格律言之，其實非通論也。（卷4，頁1437）

宋人七律當推王安石（1021-1086），然而蘇軾才力更勝一籌，不過王士禛已指出，蘇軾七律不可學習，此因其論偏頗唐音。潘德輿回應：「昔漁洋謂東坡七律不可學，石洲斥其非通論，是言各體均宜學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卷1，頁2013）不僅支持王士禛觀點，更反對學習其餘體裁。

查考此說來源，出自王士禛《帶經堂詩話》：

問明人詩可比何代，弇州可比東坡否？

明詩勝金、元，才、識、學三者，皆不逮宋，而宏（弘）正四傑在宋詩，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已，唯律詩不可學。³⁹

宋代以降詩歌孰優孰劣，與明人王世貞（1526-1590）能否比肩蘇軾，王士禛首先認為，明詩確實優於金、元，但詩家才力、見識、學養均不逮宋，僅前七子中李夢陽（1472-1529）、何景明（1438-1521）、徐禎卿（1479-1511）、邊貢（1476-1532），足與宋人分庭抗禮。至於後七子如王世貞，詩歌已非盛唐遺音，代表才力不及宋人，遑論與蘇軾相比。

不過蘇軾地位崇高，為何七律不可效法？王士禛回應：

同年劉交部公馘云：「七律較五律多二字耳，其難什倍，譬開硬弩祇到七分，若到十分滿古今亦罕矣。」予最喜其語，因思唐、宋以來，為此體者何翅千古（百）人？求其十分滿者，唯杜甫、李頎、李商隱、陸游，及明之空同、

³⁹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臺北：清流出版社，1976），卷29，頁11下。

滄溟、二李數家耳。⁴⁰

《光嶽英華集》十五卷，第一至三卷皆唐人詩，第四至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附明初詩，……所錄既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熟穩順，不爽銖黍，……然自有宋歐、梅、蘇、黃已後，律詩多變體，求其抑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此編由極變而返之正，不為無補。⁴¹

首段引文引清人劉體仁（1617-1676）評價，表示七律雖增五律二字，創作難度更添十倍，遍選歷代擅此體者，唯杜甫、李頎（690-751）、李商隱（813-858）、陸游（1125-1210）、李夢陽、李攀龍（1514-1570）。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列詩家，李夢陽、李攀龍實盛唐遺緒，宋人僅陸游入選而未見蘇軾。次段引文提及元人許仲孚（?-?）撰《光嶽英華集》，收錄唐、元、明律詩，風格偏向圓熟穩順，故忽略宋代律詩佳作，惟宋人自歐陽脩（1007-1072）、蘇軾始，逐漸揮別唐人格調，改往變體發展，此舉可識律體正、變。

足見王士禛論七律佳作，確實宗尚唐人格調，方摒除蘇軾於大家之外。即便如此，蘇詩各體仍有特色，不可一概而論，王士禛另行指出：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⁴²

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⁴³

許顥彥周云：「東坡詩，如長江大河，……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激澤靈沼，……只是體不似江河耳。」余謂由上所云，唯杜子美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右丞、襄陽、蘇州諸公皆是也，大家、名家之別在此。⁴⁴

《鳳翔八觀》詩，由八首五古及七古組成，才氣洋溢震古鑠今，只有杜甫、韓愈堪稱並肩；尤其七古更加出色，杜、韓之後無人堪比。另外，王士禛引許顥（?-?）詩評，稱杜、蘇氣勢橫溢萬鈞，充分展現大家風範；謝朓（464-499）、王維（692-761）

⁴⁰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1，頁6下。

⁴¹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4，頁11上。

⁴²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2，頁1下。

⁴³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4，頁3上。

⁴⁴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1，頁11下。

風格悠遠，格局不過止於名家，雙方差距可見一斑。

綜觀王士禛評蘇見解，實翁方綱所言為是，惟潘德輿重點是「各體均宜學」，即反對學習蘇詩，而曲解王士禛詩學。查考《石洲詩話》，翁方綱品評蘇詩各體，如下所示：

〈夜泛西湖五絕〉，以真境大而能化。在絕句中，固已空絕古人矣。（卷3，頁1408）

海寧查夏重酷愛蘇詩「僧臥一菴初白頭」之句，而并明人詩「花間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亦以為極似子瞻。不知蘇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此何等神力！而「花間」、「沙上」一聯，只到皮、陸境界，安敢與蘇比倫哉！（卷3，頁1410）

〈答任師中家漢公〉五古長篇，中間句法，於不整齊中，幻出整齊。……蘇詩最得屬對之妙，而此尤奇特，試尋其上下音節，當知此說非妄也。（卷3，頁1410）

〈武昌西山〉詩，不減少陵。而次篇再用前韻，尤為超逸，真以雲英化水之妙，為萬丈光燄者也。（卷3，頁1414）

以上四首，分別是七絕、七律、五古和七古。第一首〈夜泛西湖五絕〉，由五首七絕構成，境界宏大不顯雕琢，雖古人不及此。第二首〈龜山〉，清人查慎行（1650-1727）素喜「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句，並取明人吳一鵬（1460-1512）〈開河阻船慰同行諸君〉中，「花間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句，認為兩者極似，翁方綱駁斥其說，稱蘇詩筆力萬鈞，未可相提並論。第三首〈答任師中家漢公〉，中間句法看似參差，乃氣勢不羈所致，得五古屬對奧妙。第四首〈武昌西山〉二詩，前詩幾可比肩杜甫七古，後詩次韻更形超逸。

潘德輿在《養一齋詩話》，則另外評價：

予又考坡公七絕甚多，而合作頗少。其高才博學，縱橫馳驟，自難為絃外音。（卷9，頁2148）

初學由七古入，七古由蘇、韓入，發軔之地，取其充暢闊遠，不局才氣。既

至是則必以陶、韋、王、孟約之，一切俗想俗格，掃除殆盡，乃入門庭。而終以子美為堂奧歸宿，方與《風》、《騷》、漢、魏有息息相通處。(卷3，頁2046)

千古以來，足當「氣格豪逸」者，太白一人而已。後來蘇長公七古豪逸處，幾欲亂真。然李詩源出《風》、《騷》，痕跡都融；蘇詩行以古文，議論不廢。李實正聲，蘇為別徑，終難方駕。⁴⁵

東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一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愚謂千古詩如風水成文者，止淵明一人，辨才詩何遽語此！……至坡詩之美，又不止於「錦」。其七古豪縱處，他日自謂「文如萬斛泉水，不擇地湧出」是也。……其七律以和韻弄巧，直一機上婦，若錦不錦，猶未可定也。(卷10，頁2157)

以上重點，聚焦七絕、七古、七律。七絕簡短故尚意境，蘇軾學識豐碩，喜好鑄鑄義理於詩，難以建構深遠境界，終究隸屬別調。七古重視氣格，即使潘德輿主張師法李、杜，此處轉從韓、蘇入門，指導學子培養氣勢，復效陶潛(365-472)、王維昇華境界，終歸杜甫上達《詩經》。值得注意的是，蘇軾七古成就崇高，在於氣勢豪放不拘，幾與李白風格一致；不過李白上承《詩》、《騷》，詩歌巧妙追溯古意，蘇軾則採議論入詩，不可稱為正格。七律方面，潘德輿反對次韻，⁴⁶故蘇軾屢作此體，有誇耀才學之嫌，文采不免失色。

綜上所述，潘、翁評論蘇詩方式，影響雙方接受立場，導致結果截然相反。潘德輿運用辨體，逐一檢視蘇詩各體表現，區別詩歌正、變之分。翁方綱比較蘇軾和歷代詩家成就，尤其數度提及杜、韓，藉此讚揚蘇詩優點。由此可見，潘德輿沒有貶斥蘇詩，只是以《詩》《騷》為原則，表示蘇詩著重新變，僅能視為變體，無法

⁴⁵ 清·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1，頁2170。

⁴⁶ 潘德輿曰：「詩不可為人強作，必勃勃不可以已也而後為之。滄浪云：『和韻最害人詩。』此雖元、白、皮、陸諸公為之，然皆為人強作之一端也。而意興既到，惟所樂為者，却又宜全力與俱。」詩歌本賦詩言志，詩家自然吟詠性情，非受外力強迫所致，此處徵引嚴羽觀點，倡議即使次韻源自唐人，後人不可景仰前賢，勉強自身投入創作。因詩歌產生有固定程序，必待文思湧現後，思考意境如何實現，並全力琢磨文辭，次韻則受他人囿限，不僅基礎缺乏文思，過程更本末倒置，無益精進詩藝。參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2，頁2030。

和李、杜正格並肩，致力維護雅正詩風。

（二）潘、翁論爭詩學意義

承繼前文論述，雙方蘇詩接受不一，尤其潘德輿透過辨體，試圖限縮蘇詩影響，原因在於：「總之矯七子學唐太似之病，必然師法蘇、黃，……為偏好所蔽耳。」⁴⁷將單純詩學批評，導向清代唐、宋之爭，指出翁方綱崇蘇疑慮。清代唐、宋之爭起因，誠張健所論：

由於錢謙益等人對七子派的批判，七子派的模擬之弊日益為人們所認識，……自嚴羽到七子、雲間派，以漢魏、盛唐詩的審美傳統為基礎的審美價值系統已經建立起來，而以宋詩的審美特徵為基礎的審美價值系統則沒有建立起來。一直到翁方綱，這一審美系統才真正建立起來。⁴⁸

詩體至唐發展俱全，宋人試圖青出於藍，嘗試發展嶄新詩風，後人容易出於偏頗而攻訐異音。明代七子影響深遠，詩學崇尚盛唐風采，惟末流止步仿擬；清初詩家歷經鼎革，開始尋找更多可能，取代僵化的盛唐美學。宋詩經錢謙益（1582-1664）、吳之振（1640-1717）等提倡，漸受時人肯定及效法，甚至在康熙詩壇引起迴響，⁴⁹並至翁方綱力主崇蘇，釐清宋詩源流和特色，正式成為詩壇主流。

翁方綱標舉宋詩，不僅受宗宋思潮影響，更與政治環境攸關，如蔡鎮楚所示：

清代中葉，文網恢恢，高壓政策日趨嚴酷，詩壇空氣沉悶，金石考據、鉅釘文字侵蝕詩界，以考據為詩的「學人之詩」盛行一時。……強調為詩要根植於學。所謂「學有根柢」，則是學人之詩的基本特點。⁵⁰

清代中期文獄四起，詩家相繼埋首考據，促成學人之詩興起。據嚴明考究，唐代前

⁴⁷ 清·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1，頁2013。

⁴⁸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362。

⁴⁹ 張健指出，順治詩壇由西冷派、雲間派主導，論詩依然宗法唐音。康熙朝新秀崛起，王士禛、汪懋麟（1640-1688）等人，逐漸轉向師法宋調，北京詩壇風氣於茲變革。至康熙十年（1671），吳之振攜其選本《宋詩鈔》入京，引起當地士人迴響，正式形成宋詩熱潮，並於日後蔓延全國。參張建：《清代詩學研究》，頁366-372。

⁵⁰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頁292。

詩家多未事學術，詩歌與經史無關，為詩人之詩；宋代重視學術，學者多數兼通文墨，即學人之詩源頭。⁵¹乾嘉學風引領下，宋詩與唐詩分庭抗禮，奠定翁方綱詩學基礎，但當時詩壇由神韻、格調主導，同時標舉盛唐詩風，吳宏一認為：

明末清初以來，論詩者對於明七子惡口交詆，很少能作公正的論評，殆王士禛出，始稍為七子辯護，而對於格調之說也頗為留意，……據他看來，王士禛神韻說的可議處，只是缺少杜、韓之雄深雅健而已，因此，他提出了格古調逸的主張，來補正神韻可能流於空寂的弊端。⁵²

沈德潛非師承王士禛，但在明代七子評價上，均試圖平反負評。王士禛主張神韻，詩風崇尚清遠沖淡，兼文辭含蓄蘊藉，⁵³然內容易蹈空寂，沈德潛遂尊杜、韓雄深雅健，透過講求詩教及比興，補充神韻不足。即便如此，二派後學執著唐詩，尤其格調重視聲律音調，最終思維仍趨僵化。

翁方綱不滿此種現象，首先表示：

詩之壞於格調也，自明李、何輩誤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於格調而偽體出焉，非格調之病也，泥格調者病之也。夫詩豈有不具格調者哉？《（史）記》曰：「變成方，謂之音。」方者，音之應節也，其節即格調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即格調也。⁵⁴

七子宗尚盛唐，唯知講求音律聲調，背離唐詩技法和體貌。翁方綱徵引《史記·樂書》，認為格調含括文辭、聲律，詩家落筆即見此道，無須效法七子作為，反而失去個人風格。以此為前提，重新詮釋神韻和格調定義：

其實神韻無所不該，有於格調見神韻者，有於音節見神韻者，亦有於字句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有於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虛處見神韻者，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亦有於情致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⁵⁵

⁵¹ 嚴明：〈學人與詩人的際會合流——清代「學人之詩」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3：3（2003.9），頁65。

⁵² 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頁197-198。

⁵³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314-320。

⁵⁴ 清·翁方綱：〈格調論上〉，《復初齋文集》，卷8，頁2上。

⁵⁵ 清·翁方綱：〈神韻論下〉，《復初齋文集》，卷8，頁9下。

昔之言格調者，吾謂新城變格調之說，而衷以神韻，其實格調即神韻也。今人誤執神韻，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見，欲以肌理之說實之，其實肌理亦即神韻也。⁵⁶

王士禛所謂神韻，本指詩歌言外境界，此處卻釋神韻和格調為一體，認為神韻無所不在，甚至等同肌理。如吳宏一指出：「翁方綱以為他的神韻包含廣，而王士禛的神韻含意狹，又為了表示區別起見，所以他提出了肌理二字以代替神韻。」⁵⁷為了針砭神韻、格調膚廓，翁方綱不惜更動前人說解，趁勢提出肌理說。

翁方綱釋肌理曰：「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⁵⁸以肌理含攝義理和文理，復於〈詩法論〉云：

文成而法立，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原也。有立乎其節目，立乎其肌理界縫者，此法之窮形盡變也。杜云：「法自儒家有。」此法之立本者也。又曰：「佳句法如何。」此法之盡變者也。⁵⁹

據何繼文詮解，詩法既指文辭技巧，也涵攝性情、風格等因素。⁶⁰義理之理對應正本探原之法，為儒家敦厚宗旨；文理之理對應窮形盡變之法，指詩歌文辭鍛鑄。整體而言，肌理等同詩法，創作須兼顧文詞、義理。然若肌理即文理、義理，為何尚須另行命名？張健表示：

他用義理、文理來詮釋其所謂肌理，而義理、文理兩方面是一切文章所共具的要素，……將肌理往上說到義理、文理，則肌理與桐城派的義法就是相同的理論框架。⁶¹

乾嘉時期考據風行，桐城派文論亦同時興起，翁方綱認同姚鼐（1732-1815）見解，鎔鑄義理、考據於詩歌，並表示：「詩必能切己、切時、切事，一一具有實地，而後

⁵⁶ 清·翁方綱：〈神韻論上〉，《復初齋文集》，卷8，頁7上。

⁵⁷ 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頁243。

⁵⁸ 清·翁方綱：〈《志言集》序〉，《復初齋文集》，卷4，頁27上。

⁵⁹ 清·翁方綱：〈詩法論〉，《復初齋文集》，卷8，頁1下。

⁶⁰ 何繼文：〈翁方綱的「由蘇入杜」說〉，頁142。

⁶¹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頁667-668。

漸能幾於化也，未有不有諸己，不充實諸己，而遽議神化者也。」⁶²鑒於神韻派好發空言，要求詩歌與詩家切身相關，不可脫離感懷而獨存，只是切己之意偏重個人學養，即以經學充實內容。⁶³

肌理說提出，不僅切合乾嘉學風，更針砭神韻、格調不足，唯有宋詩迥異唐音，方能實踐該說旨要。翁方綱透過評價《宋詩鈔》，建立宋詩審美原則：

吳序云：「萬曆間李袞選宋詩，取其遠宋而近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詩則已亡矣。』」……吳選似專於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執一而論也。（卷3，頁1402-1403）

吳鈔云：「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闊，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其論固是。然宋之元祐諸賢，正如唐之開元、天寶諸賢，自有精腴，非徒雄闊也。……吳鈔大意，總取浩浩落落之氣，不踐唐迹，與宋人大局未嘗不合，而其細密精深處，則正未之別擇。（卷3，頁1421）

該書乃吳之振所纂宋詩選本，鑑於過往選本尚宗唐音，吳之振選錄詩歌多尚雄闊，亟欲凸顯宋詩特點；翁方綱肯定其舉，不過宋詩風格如唐詩多元，僅擇雄闊總括宋詩，未免埋沒宋人特長，故另行指出：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圍也。（卷3，頁1426）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卷3，頁1426）

宋人講求學識，兼小說、筆記大量出版影響，文理趨於縝密，以細膩觀察和評論，雕琢人物情致風韻，與義理精深幽微，即刻抉入裏。唐詩以抒情為主，詩家多藉奔騰想像，形容內心情思；宋詩分道揚鑣，運用精嚴謹目光，刻劃事理細節，脫離唐詩樊籠。

⁶² 清·翁方綱：〈神韻論中〉，《復初齋文集》，卷8，頁9上。

⁶³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頁535。

由此可見，翁方綱青睞宋詩特點，非常人所見雄深豪放，乃細膩思維構築之精微，蘇詩鎔鑄義理、議論、學識於一體，更是精於此道，有助矯治宗唐者不足。實際上，對於翁方綱尊宋崇蘇，用於針砭七子流弊，潘德輿並未表示反對，惟不應過分偏愛，故云：「夫蘇、黃之詩，標新立異，旁見側出，原令人目眩心搖。然久於其中，竟謂舉世之人，舍此斷無出路，何其輕量人才之甚也！」（卷1，頁2012）蘇軾欲別唐音，詩風趨於競奇鬥險，有失醇厚雅正意旨，學子僅師法其獨特處，當無益於創作。

實際上，相似觀點亦可見於清人詩論，下文臚列清代初期至中期各家評論，製成一表以窺梗概：

表1 清代初期至中期詩家蘇詩評論

詩家	生卒年代	評論
朱彝尊	1629-1709	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為奇，俚鄙以為正。 ⁶⁴
吳之振	1640-1717	子瞻詩，氣象洪濶，鋪敘宛轉，子美之後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豐縟，雖其學問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盡也。 ⁶⁵
賀裳	約康熙年間	坡公之美不勝言，其病亦不勝摘，大率俊邁而少淵渟，瑰奇而失詳慎，故多粗豪處、滑稽處、草率處，又多以文為詩，皆詩之病。然其才自是古今獨絕。 ⁶⁶
袁枚	1716-1791	東坡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於天分高，學力淺也。 ⁶⁷
趙翼	1727-1814	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鍊。 ⁶⁸
方東樹	1772-1851	東坡橫截古今，使後人不知有古，其不可及在此；然而遂開後人作滑俗詩，不求復古亦在此。 ⁶⁹

上表按詩家生卒年代先後排列，當能看出潘德輿所評實非創見，前人不乏批評蘇詩不足者。然而，若由唐、宋之爭角度詮釋，更能一窺清代初期至中期評蘇大觀，崇

⁶⁴ 清·朱彝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曝書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38，頁7下。

⁶⁵ 清·吳之振：〈蘇軾東坡詩鈔上〉，《宋詩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4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20，頁2上。

⁶⁶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清詩話續編》，頁427。

⁶⁷ 清·袁枚：《隨園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9），卷7，頁10上。

⁶⁸ 清·趙翼：《甌北詩話》，《清詩話續編》，頁1201，「蘇東坡詩」條。

⁶⁹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樹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卷1，頁5。

尚唐音者，⁷⁰如朱彝尊批評清人厭棄唐音，多數轉向提倡宋詩，反而矯枉過正。賀裳則指出，蘇軾才力雄深壯闊，惜主張以文為詩，整體風格趨於俚俗，導致好奇尚硬之弊。以上二人觀點，亦可見於出身桐城，理念與翁方綱近似的方東樹詩論，⁷¹他認為蘇軾才華震古鑠今，後人唯知蘇詩而不求古意，竟大率效仿其中滑稽、俚俗詩作，實非學詩之道。吳之振力主宋詩，卻也提出蘇軾好用典故，內容稍嫌繁瑣。袁枚主張詩歌不必區分唐、宋，⁷²稱許蘇詩才氣橫溢且富有旨趣，惟情致缺乏而韻味不足，歸咎為天分高於學力之故。趙翼與袁枚理念相似，則讚揚蘇詩氣勢奔騰，惜用字遣詞不甚鍛鍊，故有白璧微瑕之嘆。總而言之，清代詩家無論主張唐、宋，多能客觀指出蘇詩流弊，故潘德輿絕非攻訐異音，只是倡導跳脫唐、宋，表達過分崇蘇疑慮。

更重要的是，《養一齋詩話》成書於道光朝，詩學風氣迥異翁方綱身處之乾隆朝，故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也具備時代意義。乾隆朝為清代盛世，政治局勢穩定，促進文學蓬勃發展，如霍有明表示：

這一時期的詩歌在反映社會生活和揭露現實矛盾方面顯然要遜於清初。但就藝術而言，這一時期的詩歌則呈現出十分繁榮的局面，……即使是這種在藝術方面的探究，也往往多少受到當時官方意志和文化專制政策的影響或制約。⁷³

乾隆朝廷續康熙、雍正國勢，社會普遍繁華昇平，詩家更有餘力投身創作，是以詩壇百家爭鳴，無論神韻、格調、性靈、肌理諸說，均於此際相繼問世。不過朝廷厲行思想鉗禁，詩家避免禍患纏身，諸如格調派倡導詩教，肌理派兼通考據，藉由鑽研理論和技法，迴避政治相關議題，詩歌缺乏社會寫照。

道光朝已步入中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詩學思潮隨之更替，如霍有明指出：

⁷⁰ 蔡鎮楚梳理清初宗唐派詩話，指出：「以吳偉業開其端，繼之而有施閏章、朱彝尊、馮班、吳喬、賀裳、趙執信等等。」參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頁 228。

⁷¹ 郭紹虞認為，方東樹詩論基本上非遵肌理，但與翁方綱受乾嘉學風影響，均為學人之詩代表，可稱為肌理說餘波。參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1068。

⁷² 如袁枚白云：「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參清·袁枚：《隨園詩話》，卷 6，頁 9 上。

⁷³ 霍有明：《清代詩歌發展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155-156。

乾隆後期，政治上的腐敗，使社會矛盾逐漸激化。……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這一古老的封建帝國終於被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叩開了大門，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是為近代。受時代的特徵所影響，這一時期的詩歌則呈現出新的特色。……或表現社會中下層窮苦知識分子最深沉的心態，……從不同側面透視出封建末世本質，具有典型的歷史真實性。⁷⁴

乾隆朝晚期，經歷長年高壓統治，與保守思維控管，社會亂象相繼浮現，至道光朝爆發鴉片戰爭，西方勢力東漸侵蝕，朝廷已無餘裕應對。詩家打破沉默，開始關注時事國情，藉由詩歌描繪現實，嘗試挽救國家頹勢。

潘德輿提倡詩教，看似延續乾隆朝格調派理念，詩歌須為政治服務，但在社會風氣影響下，也有針砭現實寓意。如蔡鎮楚曰：「潘德輿身處嘉道時代，曾心懷一腔熱血，希冀濟世匡時，然而仕途多舛，無用武之地。可以說，他的詩學主張，正是他濟世之志在詩學理論上的真實反映。」⁷⁵鄔國平和王鎮遠也認為：「他強調『詩教』，注重人品，提倡質實，也確有感於當時政治的頹敗和詩壇流弊。」⁷⁶均可看出，潘德輿以詩教為核心，提出正人品、尚質實等理念，不僅用於詩學批評或服務政治，更是亟欲針砭時政，達成救亡圖存目的。

亦因如此，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未止於唐、宋之爭，更希望透過《詩經》現實意義，矯治翁方綱詩學問題。源自翁方綱提倡肌理，並標舉蘇詩特點，乃擇質實為號召，惟借考據、經學充塞內容，不免炫才逞能、推砌義理，詩歌仍與現實脫節。潘德輿亦求質實，卻擇漢、魏為典範，強調抒發性情與時事，理念迥異翁方綱，更數度呼籲：

言志者必自得，無邪者不為人。是故古人之詩，本之於性天，養之以經籍，內無怵迫苟且之心，外無夸張淺露之狀；……諛頌悅人之篇，鉅釘考古之製，窮工極巧，瀟灑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卷1，頁2006）

古人之文，有用而後作，明理道、述政體，陳生民利弊，……說經者爭鉅釘

⁷⁴ 霍有明：《清代詩歌發展史》，頁296-297。

⁷⁵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頁298。

⁷⁶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頁535。

瑣屑，論史雜功利于當世巨公，聞人諛頌不容口，讀之未終卷輒倦思臥，蓋其誠不足以動吾心也。……先秦盛漢之人，不知文家義法為何事，衝口而出永永不漸減者，所積渾淪旁魄，夔無畔涘，非後世剽竊綴緝，朝盈夕涸之學也。⁷⁷

古人思想根植《詩經》，憑藉純正性情及學養，書寫家國興亡和民生疾苦，風格樸實而凝鍊。後人僅欲沽名釣譽，更甚者有通達經學者，唯知考據經籍義理，鑽研文辭訓詁排比，失去古人賦詩言志，自然真切之韻味，更無助於匡扶政教。此處批評對象，雖未聲明為翁方綱，不過句句指陳其論缺失，顯示時局變遷下，道光詩壇思潮轉化，及對前朝詩學反思。

綜上所述，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攸關清代詩學及時代環境遞嬗。清初詩家反思七子宗唐問題，相繼提倡宋詩以炙其弊，論詩因此區分唐、宋。翁方綱不滿神韻、格調流於膚廓，透過尊崇宋調和蘇詩，提出肌理以奠定審美，促使宋詩晉升主流。潘德輿肯定其用心，但反對偏愛蘇詩，衍生過分好奇、文辭俚俗等問題，唯恐學子限於門戶。另外，乾隆至道光年間，中國局勢由盛轉衰，乾隆詩家身處太平，及朝廷思想箝制下，詩學理論成就斐然，卻喪失寫實意義。道光詩家目睹國難，開始留心社會時事，反思前人詩學不足，潘德輿趁勢提倡詩教，批評翁方綱耽溺考據，重振詩歌現實關懷作用。

四、結論

清人潘德輿撰《養一齋詩話》，思想根植《詩經》，提倡賦詩言志、溫柔敦厚之詩教觀。該書品評清人詩話，稱翁方綱《石洲詩話》雖受推崇，其中議論有待商榷，因由啟人疑竇。學界目前研究成果，如郭紹虞推究唐、宋之爭，吳宏一主張學詩進

⁷⁷ 清·潘德輿：〈與吳生大田書〉，《養一齋集》，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2，頁13下-14上。

路差異，二說均見後人支持，至今未有結論。筆者查閱《養一齋詩話》，發現潘德輿從學詩進路入手，接續辨證翁方綱評蘇是非，原因似乎擴及蘇詩接受。另外，二書為乾隆朝和道光朝重要詩論，論爭是否攸關清代詩學變遷？本文以此為核心，追溯潘德輿批評思路，取《養一齋詩話》批評為主，參酌《石洲詩話》與相關論著，透過潘、翁學詩進路和蘇詩接受比較，一窺論爭因由及詩學意義。

學詩進路方面，潘德輿尊崇《詩經》，主張創作須資政教，學子當求質實真義，逐日涵養性情學問，成就詩教精神。因此，他建構李、杜入門，上溯漢、魏，終歸《詩經》之進路，力求雅正醇厚詩風，賦予創作嚴肅意義。翁方綱宣揚調和唐、宋，亦奉《詩經》為主臬，透過辯證理字內涵，奠定杜詩典範地位。唯恐學子誤學杜詩，翁方綱標舉蘇詩入門，藉由推廣精微風格，呼應杜詩精髓。是知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不僅源於學詩進路差異，更涉及學習《詩經》時，如何定義蘇詩。比對潘、翁詩學可知，宋人以蘇軾為首，提倡以文入詩觀點，乃雙方歧異癥結。潘德輿力求雅正，反對宋人詩近語錄，文辭俚俗而無文韻。翁方綱欲推廣宋詩，稱以文入詩合乎詩教，故重視蘇詩地位，建立由蘇入杜途徑。

由此可見，此次批評確切因由，即為是否接納蘇詩。潘德輿繼續以王士禛論述為據，辯難翁方綱品評夾雜偏見，鼓勵學子廣從蘇詩。惟考《帶經堂詩話》，王士禛尊崇唐音，故翁方綱所言得之，從中推論潘德輿批評立意，實蘇詩各體接受與否。故從辨體而論，翁方綱讚揚蘇軾各體俱佳，甚至能與杜、韓並肩；潘德輿取《詩》、《騷》為基準，視蘇詩為別調，奠定李、杜正格地位，意欲維護《詩經》傳統價值，與清代唐、宋之爭，和詩學流變息息相關。

清初詩家歷經鼎革，反思明代七子宗唐流弊，相繼轉效宋詩風格，論詩因此區別唐、宋。翁方綱鑒於神韻、格調失之膚廓，標舉宋調和蘇詩特點，藉此提出肌理以弋其弊。潘德輿肯定此舉，惟不應偏愛蘇詩，衍生過分好奇、文辭俚俗問題，呈現超越門戶思想。另外，乾隆至道光年間，政治局勢趨於頹敗，乾隆詩家身處太平，兼受思想鉗禁影響，多數鑽研詩學理論，忽略詩歌寫實功能。道光詩家經歷國難，開始反思前人不足，潘德輿據此重振詩教，針砭翁方綱尊崇蘇詩，僅為推廣經學、

考據入詩，缺乏社會寫實問題。

整體而論，潘德輿批評《石洲詩話》，表面看似意氣之爭，實際扣合時局，反映清代中葉詩壇變革。源自道光朝社會動盪，詩家逐漸正視現實，抒發經世濟民理想，潘德輿崇尚《詩經》，觀點看似保守，卻由質實重視性情，堅持創作有裨政教，凸顯當時詩壇思潮。前人如翁方綱也推尊《詩經》，意在調和唐、宋之爭，卻以學詩進路為由，趁勢抬升蘇詩地位，加強經學入詩合理性，隱含乾隆盛世下，詩家迴避政治議題，相繼投身考據現象。潘德輿力排眾議，重新規劃學習《詩經》方式，強調蘇詩為辨體，避免學子重蹈唐、宋之爭，重振詩歌現實意義。由此可見，潘德輿批評初衷，並非出於門戶之見，或特意針對翁方綱，實具重要詩學意義。